编者按：《习近平：正圆中国梦》是俄罗斯埃克斯莫出版社2015年5月初隆重出版、作为欢迎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俄罗斯举行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的友好象征。该书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条主线，介绍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成长经历和家庭环境、中国梦提出的时代背景和过程，高度评价了习近平总书记为实现中国梦提出的一系列重要新思想新理念新举措。该书作者尤里·塔夫罗夫斯基是俄罗斯著名汉学家、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教授，对中国历史有深入研究，持续关注中国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论与新实践，治学严谨，对华友好。征得作者同意，本报从今日起对该书部分内容进行连载，敬请广大读者垂注。

有极高才智有坚定信念的人

——《习近平：正圆中国梦》导言

□ 〔俄罗斯〕尤里·塔夫罗夫斯基

2012年11月习近平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不久，我就想写一本关于习近平主席的书，在研究了其新构想的基本原理及大量相关文章后，我意识到，中国出现了一位非凡的领导人。在走上这个领导岗位时，习近平清楚地意识到，在未来10年里他不只要解决现在的问题，保障国家平稳发展，甚至要影响整个世界的发展。“两个一百年”（2021、2049年）宏伟目标的提出，彰显出新领导人的高瞻远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为中华民族树立了催人奋进的战略目标。

“中国梦”构想融入了习近平60年的生活经验：长期与贫穷的农民一起从事繁重的劳动，在村、县、市、省各层级的几十年管理工作，对中国古代先贤著述和马列经典的研读。

从这一构想中也能看到习近平父亲习仲勋的遗愿。这位老一辈革命家不惧“逆流”，迎难而上，虽曾饱受迫害，但平反后在中国沿海省份建立起了著名的“经济特区”，最终圆了自己的“中国梦”。

“中国梦”的构想并不是“一张白纸，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这一构想汲取了历代统治者的深刻教训，包括大国地位的衰落、经济试验的悲剧、政治上的冒险等。这一构想以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改革开放”战略为基础，正是这一战略使中国走上了成功的轨道。

“中国梦”构想一方面冷静分析了国内问题和国际形势，另一方面也充满着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这种理想主义曾使中国仁人志士敢于直面日本和国民党的猛烈炮火。“中国梦”构想还凝结着建设公平社会的夙愿。

习近平及其伟大的先人们

从中国的历史上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每过几百年，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就会出现影响后世的非凡领导人。他们能把握国家发展的正确方向，发挥自己的领导魅力和强大能量，推动国家发展。他们胸怀战略抱负，并因这些战略的成功实施而名垂青史。

“全中国”的第一位皇帝秦始皇认识到国家必须统一，他通过多年征战打败了其他诸侯国，最终统一了全国。他非常残暴，其帝国总共只存在了15年（公元前221—前206年），但他为抵御外敌开始修建长城，统一了货币、文字、道路和建筑标准，创建了有效的行政体系。实际上，正是他为后来中国的统一和强大奠定了基础。

汉武帝因创建稳固和先进的文明而名垂青史。因此，几千年来中国人将汉朝名称的“汉”作为中华民族的自称——“汉族”。秦朝灭亡半个世纪后，汉武帝执政。这个国家因农民起义和内部纷争而再次分裂，武帝的曾祖父、祖父和父亲重新统一了国家。汉武帝及其祖先让老百姓过上了正常的生活，也从秦始皇身上汲取了残酷教训。此前，秦始皇通过残酷压榨老百姓，建造了数以百计的宫殿、堡垒和道路，焚书坑儒。汉武帝还曾派外交使节、探险家张骞出使西域，后又派商队前往，由此开启了“丝绸之路”。他开始与北方游牧民族匈奴建立睦邻友好关系。当年正是为了抵御这个民族的侵扰而修建了长城。

汉武帝与腐败奢侈作斗争，平息了一些诸侯的谋反，制服了自私自利的达官贵人。他虽然恢复并推崇儒家学说，但并未全盘否定秦始皇所推崇的以暴力和惩罚作为管理手段的法家学说，同时还吸纳其他学说，确立了新的国家意识形态。他招贤纳士，鼓励发展教育和科学。他最主要的功绩是激发了人民的创造力，减少赋税，放宽各类限制。为应对人口数量的激增，国家建设了许多水利设施、道路和城市，帝国的疆域不断扩大。汉武帝统治了相当长时间，整整53年（公元前140—前88年），汉朝总共存在了4个多世纪（公元前206—220年）。

伟大的唐朝的创建者是李渊，他把两种文明——中华文明和突厥文明融合在一起，拓宽了大国疆域及其势力范围，通过加强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使国家更加富裕，把外来佛教文化与传统儒家文化有机结合在一起，为长达350年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基础。中国人认为，唐朝（618—907年）是中国最鼎盛的时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

明朝的建立者朱元璋则是普通士兵出身，他为推翻蒙古统治而战，击败了外来民族，致力于复兴中华民族。正是他为中华艺术和手工业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将中国变成了“世界作坊”，沿着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中国的商品被运到了遥远的世界各地。朱元璋的事业及大明王朝维持了276年（1368—1644年）。

富有进取精神的清朝统治者在击败朱元璋骄奢淫逸、不思进取的子孙后，很快建成了比明朝更强大的国家。两位伟大的统治者，康熙和乾隆祖孙二人各统治了61年和60年（1662—1722年，1736—1795年），他们促进了中华文化的繁荣，推动了经济正常有序发展。在他们统治时期，中国人口增长了数倍，有效统治的疆域也达到了中国历史上之最。然而，伟大皇帝所提供的原动力日趋减弱，鸦片战争和农民起义先后爆发，最终导致清朝走向衰亡，历经268年后被推翻。

推翻腐朽清朝的革命家孙中山，也曾梦想过复兴中华民族，但他未能实现自己“民族、民权、民生”的理想。他的“三民主义”仅实现了第一步，即于1911年推翻了清朝统治。作为中华民国首任总统，他的执政时间不是以年计算的，仅有几个月。

毛泽东可以说是新“红色中国”的缔造者。他凭借着高超的智慧和谋略，完成了中国统一大业。但这位“伟大领袖”没有实现民族发展的战略计划，使国家陷入无休止的斗争。他领导中国的时间段是1949年至1976年。

邓小平挽救了“红色中国”。邓小平在自己周围团结了一批英明的、有经验的党和国家活动家，这些人曾险些像秦始皇时的儒生一样失去生命。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他们合力粉碎了篡权者的疯狂行径，使国家走上了正轨。

习近平的世纪

习近平似乎在执政之前就已形成了对未来中国的愿景，且这一愿景的时间节点是2049年，到那时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一愿景涵盖了未来中国的经济、社会生活、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文化、在国际上的地位等方方面面。

习近平为每一方面都作了精心准备：或是进行了深入思考，或是写成了专题材料。这些内容有的体现在全党会议议事日程中，有的体现在他的讲话或文章的核心思想中。习近平对国家治理有一套系统的规划。这些规划有些是根本性的、打破常规的，或用时髦的话来说，是创新性的。它们有别于那些过时的、鲜有效果的模式。

习近平急于在为中国提供的机遇期内实现自己的改革计划，因此，还没等计划完全落实，经济构想、对外政策倡议就一项接一项地密集出台。不仅外国人，就连中国的政治学者也只刚刚分析和领会一项新决定，下一项又出台了。在写作这本书的4个月时间里，我不得不多次重新写作关于对外政策、经济改革、反腐败、中俄关系这几章。

人们自然而然地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习近平这些大规模的创新举措究竟是从哪里来的？”这些他刚担当最高领导职务就提出来的战略构想和政策倡议，看来出乎意料，实际上可以在他生平履历和生活经验中寻到答案。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能够让人想起他父亲的故乡和他下乡的陕西省，古老的商路正是从这里出发的。“海上丝绸之路”构想能够让人想到他在福建和浙江工作的岁月，几个世纪以来商队从这里出发走向远方。对各种腐败分子——“老虎”“苍蝇”“狐狸”的零容忍的根源，源于习近平在政治生涯的早期阶段与贪婪官员的斗争。在落后的县城和在沿海省份的领导岗位上，他都喜欢制订长期的计划和提出战略性的构想。让人没想到的是，尽管不会说俄语，但他向往普希金的故乡，对苏俄文学感兴趣。他曾偷偷阅读被禁止的“修正主义书籍”，聆听父亲讲述访苏经历。

爱国主义和忠于信仰的基因

我对中国现今领导人习近平的了解是从他父亲习仲勋的命运开始的。习仲勋坚信正义的力量，早在青年时期就已成为职业革命者；他在20年的游击战生涯中一直坚持自己的理想，不止一次地险些遭受敌人或朋友的子弹。作为建立新中国的一名元老，他并未因身居高位而“腐化”，依然保持了青年时期对共产主义理想的信仰和建设祖国的强烈愿望。他从中国西北革命老区走来，在中国南方建立了经济特区，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窗口和引擎。

通过对习仲勋变化无常命运的研究，我更好地理解了他的儿子，在黑暗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他差一点丢了性命，但他却仍然保持了对社会主义正义事业的信念，相信绘有锤子和镰刀的红色党旗对中国命运是有益的，衷心希望改善自己人民的生活，不能容忍腐败行为寄生在党的肌体里，这使习近平果断地从打大“老虎”开始行动。

刚一开始研究中国的对外政策我就感到吃惊，后又被中国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上非同寻常的积极性所鼓舞。就像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号”一样，习近平离开了熟悉的海岸驶向了更广阔的不平静的世界政治海洋。

习近平在理论方面的积极创意让人想到“新型大国关系”“新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等。习近平在外交实践领域给人印象深刻的是在国外访问的高效性、成功地在中国举办大型国际论坛、开始建立新的世界金融体制等。

毫不夸张地说，正是从习近平当政开始，中俄关系迎来了第二次高潮：扩大了经贸合作的规模，在国际舞台上加强了协调，更重要的是，莫斯科和北京之间、两国人民之间的信任和好感在增加。

“君子”意为“高尚的人”

我花了整整两年时间来分析和理解另一个国家领导人的言行，也许我没有权利对习近平的道德品质作出最终评价。但就我目前的印象，套用孔子的说法，习近平是一位真正的君子、一位高尚的人。

青年时代，尽管条件极其艰苦，用孔子这位先师的话说，他“志于学”。

三十“而立”，整个县治理得井井有条。

四十“不惑”，所领导的省锐意改革。

五十“知天命”，应对逆境，蓄力“腾飞”。

六十“耳顺”，“明辨是非”，领导国家排除一切阻力，坚定不移向前发展。

按照孔子的话说，习近平到70岁，即2023年，完成了10年任期的他将“从心所欲，不逾矩”。

就像高尚的君子一样，习近平在父亲落难期间保持了对他的忠诚，照料日益衰老的母亲。

就像高尚的君子一样，他找到了真诚的伴侣，建立了稳定的家庭，可谓“龙凤配”。彭丽媛是杰出的、具有鲜明个性的民歌演唱家，他们的故事让我觉得像是一部浪漫主义小说。即便在艰难的环境中，他们也能够捍卫家庭，培育子女。这也是君子的内核所在。

“高尚的人”最重要的责任是把报效祖国作为天职，无论遇到怎样的诱惑和风险，都毫不动摇，不违背道德准则。

在完成本书时，我面前出现了习近平的三个鲜明形象：有极高才智的人、有坚定信念的人、担当现在和创造未来的人。希望读者也能有此感悟。

大国领袖的个性影响广泛，其同胞生活的许多方面、邻国的国民，甚至世界的命运都与此有关。我相信，习近平作为一位政治家，深信巩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符合中俄两国人民的利益，并会在未来10年中俄关系发展中起重要作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俄罗斯人要深入了解他的原因。

全球治理核心理念：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 蓝蔚青

在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讲坛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深刻总结一战爆发以来的百年历史经验，把握时代脉搏，面向人类未来，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目标，系统阐述了“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的总布局和总路径。在这五个方面，习近平总书记都根据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言简意赅地指明了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作为一个在世界舞台上举足轻重的负责任大国的领袖，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的新兴大国对事关人类命运的重大问题的认识和态度，深刻揭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环境和国际战略。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大发展。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核心理念的提出，是基于对当今世界格局的深刻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坚持我们党关于时代主题的科学判断。他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现在，世界上的事情越来越需要各国共同商量着办，建立国际机制、遵守国际规则、追求国际正义成为多数国家的共识。”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各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之中，以相互依存为前提。全世界人民处于“地球村”这个共同体中，在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蝴蝶效应”频频发生，各国人民相互依存、休戚与共达到空前的程度。损人利己的举动，可能很快就会带来“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甚至“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后果。气候变暖、环境污染、金融危机、难民大潮等等一再证明这一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对这一基本事实的如实反映。

这一核心理念的形成，也是深刻总结两次世界大战惨痛历史教训的结果。在上个世纪，人类经历了惨烈的两次世界大战，付出了几千万人的空前牺牲，世界各国人民在战争中遭受了深重的苦难。反对战争、保卫和平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正是人心所向，使和平成为时代主题，和平力量超过战争力量。两次世界大战也证明，用战争手段争夺资源和资源的控制权，必然造成资源的极大破坏和浪费。唯有发展，才能消除冲突的根源，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只有共同发展才能使资源得到合理高效的利用，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也成为时代主题。

这些共识得以形成的主观条件，是全人类有着基于共同利益的共同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联合国并没有强大的武装力量，更没有掌握任何战略武器，却能在解决国际问题特别是全球性问题中发挥重要作用。这说明，谁高扬全人类的共同价值的旗帜，占领道义上的制高点，谁就能在世界范围内赢得人心，发挥领导力。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得人心者得天下，迷信武力者必然像德日意法西斯一样自取灭亡。

矛盾的同一性中存在着斗争性。国家、民族、阶级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要实现上述目标，贯彻上述原则，决不是轻而易举的，必然要经历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尖锐的斗争，包括军事斗争。在这些斗争中，我们坚决维护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关系和国际治理、安全保障、共同持续发展、不同文明相互交流互鉴融合以及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五个方面，放眼全球，科学总结70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倡导一系列已经被实践证明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深得人心的新理念。这是对我们党多年来主张和追求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全面阐述，可以说是提出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五项基本原则。

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必然涉及如何对待现行国际秩序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华盛顿州欢迎宴会上的演讲中明确宣布：“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我们坚决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是吸取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而建立起来的。联合国宪章奠定了现代国际秩序基石，确立了当代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联合国已成为最具普遍性、代表性、权威性的国际组织，和平与发展成为联合国最重要的议题，联合国也成为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的最重要平台。

当今世界发生的各种对抗和不公，都是由于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还未得到有效履行。我们所主张的改革完善，是要改变全球治理体制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推动各国在国际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法治化，努力使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的意愿和利益。中国日益提高的国际地位和得到的日益广泛的支持和同情，也使我们有力量在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定方向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大宣布的中国支持联合国更好发挥作用的一系列实实在在的举措，既用实际行动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同时又是增强中国的话语权和对国际秩序影响力的有效举措。

发展与现代化

不可误读党纪“负面清单”

□ 邱炜煌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把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对党组织、党员的纪律要求，整合成了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六大类，不但明确了禁止什么，而且还明确如何处罚，所以人们称之为党纪“负面清单”。笔者认为，负面清单只是一种形象表达，旨在强调《条例》明确纪律底线、执纪标准，体现纪严于法、纪在法前。我们不可照搬照套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更不能由法无禁止皆可为推理为只要《条例》没有禁止的党员都可以做。

负面清单原本是指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其核心是法无禁止皆可为，即在不违法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放开市场准入。由此可知，法无禁止皆可为的底线是法，而不是清单本身。清单之外有底线，负面清单下的投资主体不但不能进入清单内的领域，而且还必须符合国家法律要求。如上海自贸易区负面清单之外就有法的约束，规定除列明的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还禁止投资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全的项目，禁止从事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经营活动。换言之，清单只是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同样的道理，《条例》对党组织、党员的纪律要求也只是一个必要条件、底线要求，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方面的要求，那种认为只要《条例》没有禁止党员都可以做的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落实《条例》要体现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只讲底线还远远不够，必须坚持底线高线并举，体现“一靠理想、二靠纪律”的要求。

一是把握纪律底线，《条例》所禁不可违。《条例》强化刚性约束，明确规定违反六类纪律都要受到相应党纪处分，尤其是把党章对党组织和党员的要求细化，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要求具体化，把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反对“四风”方面要求转化为纪律条文，把权权交易、利用职权为亲属谋利等突出腐败行为纳入违纪条款，对破坏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行为作出处分规定等，体现了纪律挺在法律前面。

二是严格执行纪律，违反《条例》必追究。落实《条例》不但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敬畏纪律、守住底线，而且还需要执纪部门违纪必究、依规执纪。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纪律为准绳，既不搞法不责众、选择性执纪，也不能受领导批示、媒体曝光的干扰和制约，脱离《条例》规定来执纪，甚至从重从快。执行《条例》要把握政策界限，注意腐败分子与犯错误干部的区别、权钱交易与工作失误的区别、严重腐败与一般违纪的区别、对抗组织调查与主动自首检举的区别，既统一执纪标准，又视其性质、情节区别对待，做到宽严相济，严而不苛。

三是坚守行为高线，摒弃《条例》未禁皆可为的思想。全面从严治党既要靠纪律又要靠理想，《条例》之上还有《中国共产党廉政准则》，不可厚此薄彼、顾此失彼。党组织和党员切不可满足于守住《条例》底线、不被查处，而要与《准则》对标，树立高尚精神追求，筑牢思想道德防线，把握是非标准，遵守党的规矩，做到底线与高线统一、自律与他律统一，自觉做到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即使《条例》未禁止的也要三思而行。

专家视点